

湖南辛酉春荒(1921年)及成因之考察

张安东

(巢湖学院历史系, 安徽巢湖, 238000)

摘要: 自古以来湖南就是全国粮食最重要的产区之一。明清以降, 湖南的粮食生产仍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然而, 湖南却于1921年春夏间发生了空前的春荒。春荒具有延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的特征。导致此次空前春荒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尽管存在气候失调、粮食减产等因素, 但基本原因却是兵灾匪乱与沉重的捐税负担, 弄得民穷财尽, 湘民承受灾荒的能力十分脆弱, 以及省县财政濒于破产与金融枯竭, 遭遇春荒, 挽救乏术, 结果使春荒越演越烈。总起来说, 七分系兵灾匪祸, 三分为水旱等天灾。

关键词: 春荒; 兵灾匪祸; 天灾

中图分类号: K264.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1-0095-06

明清以降, 湖南的粮食生产即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辛亥鼎革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 湖南的稻米总产量及境外输出量仍为全国之冠^[1], 堪称全国的大粮仓。然而, 湖南却于1921年春夏间发生了空前的春荒。本文拟对1921年湖南春荒作一初步探讨, 以期丰富荒政史研究的内容。

一、春荒概况

1921年湖南辛酉春荒发生之前夕, 最先呈现荒象端倪的是安化县。本来该县粮食勉强可以自供, 加以邻近产米大县益阳、常德, 在一般情况下, 似不应首先发生灾情。但事实上, 早在1920年7月, 安化城区及附近之常归两镇, “居民十常七八无米为炊”, 乡间恃为生活大宗之红薯包谷本年春因故概未下种, “坐食殆尽”^[2], 秋收无望, 预示春荒将不可避免。1920年11月, 觅食无着的安化蓝田镇饥民开始乘船涌向省城乞食^[3]。冬春之交, 该县即“比户闻啼号之声, 尽人有饥馑之色”, 而此时距离1921年秋收, 尚有七八月之久。

接踵而起的是长沙东部的醴陵县与辽阔的湘西地区。自1921年初春起, 醴陵县“即已发生荒象, 请照逃荒者日必数起”, 官绅无力阻止^[4]。4月, 荒情愈趋严重, 全县饥民不下数十万, 他们多数卖儿鬻女, 苟全生命, 穷僻之乡则食菜根树叶以及观音土等物。湘西处境更加凄惨, 1921年2月即开始闹荒, 永顺、保

靖、龙山、桑植、绥宁、古丈六县“乡间采蕨充饥, 城厢恒无米上市, 荒象已成”^[5]。4月, 湘西各县米价奇昂, 灾情最重者首推沅江、乾城, “该两县不仅米谷无有, 杂粮绝迹, 即青草菜根, 亦几等于黄金白银”^[6]。因饥饿而倒毙或以无可谋食而自戕者时有所闻。

5月以后, 全湘进入青黄不接的最为困难的时期, 因此时距离夏收尚有近三月的时间, 距秋收则有四月之久。全体湘人度日如年, 而湘省春荒发生后, 省内外赈济乏力, 结果春荒以更猛烈的程度在全湘蔓延。

先来看中路。中路是指以长沙为中心的周边区域, 共计27个县。该路历来是湖南主要的产米地带, 经济素称发达。然而, 春荒首先发生在中路的安化与醴陵。在经过数月饥荒的煎迫后, 处境更加恶化。米价飞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按照二十年代的消费水准, 湘省米价, “如每升过百文, 即为荒年”^[7]。安化米价到5月份, 竟涨到了1400文一升的地步^[8]。全县饥民40余万, 相率逃荒, 道路相望, 如同黑蚁。该县女子论斤出卖, 每斤仅售铜子八枚, 竟无受主。田地作价极贱, 亦无人问津。该县曾经“五日之间, 人民之饿死胀死(因以神仙土稻草为食)及因饿而自尽者至八十余口之多”^[9]。醴陵谷价在光绪极荒之年不过每石1000多文, 此后从未超过2000文。5月, 该县谷价层层攀高, 每石竟需5000~6000文, 实为该县历史上“亘古未有之苛价”, 该县饥民数十万, 如潮水般涌向邻县及长沙等地, 安土重迁者不数日之间“因觅食不得而饿毙者百数十计”^[10]。中路的其他县份自5月

收稿日期: 2007-11-05

作者简介: 张安东(1964—), 男, 安徽庐江人, 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巢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

份起亦纷纷报荒。至6月中旬止,中路报荒县份达到22个,其中如宝庆、新化等县灾情仅稍逊于安醴两县。长沙、湘阴、岳阳、临湘、临醴等五县虽未报荒,实际上亦倍感米荒压力之重,以长沙为例,该地历来中米每石不过3元余,1921年5月,竟涨到8元余,一般贫民难以为生,乃群聚围困碓户,引发社会动荡^[11]。后紧急自益阳、湘潭等地购米接济省城,米荒压力才略有缓解。

再来看西路。西路即指湘西一带,共计24个县。该路除个别县份外,绝大多数地瘠民贫,粮食素来不能自给。该路自1921年春闹荒,至5月灾情空前严重。除了桃源外,其他23县均在受灾之列,其中如沅江、乾城、永顺、龙山、大庸、保靖、桑植等县灾情与安、醴二县难分伯仲。5月醴陵米价每石在十吊以内时,龙山大庸米价早已涨至每石二三十吊。沅陵、乾城极糙之米,每升亦需400余文(平常每升40余文)，“此种荒象,实为沅陵六十年所未有”^[12]。晃县米价,“每斗需钱五六串,为数千年未有之奇闻”^[13],武冈平常斗米不过三角左右,现涨至一元,尚无处可购,愤怒的饥民挨户搜抢,官厅无可奈何^[14]。至5月中下旬,湘西各县前此赖以生之畜类及瓜菜均已食尽,不得不改食各种树草。6月起,春荒尚在发展,又遇干旱,树草亦求之不得,只得以鲜苔泥土为食料,诚如媒体所揭示,“所食之品,为古今世界人类中所未闻者”^[15]。结果湘西饥民每县动辄十余万,沅陵一县多达40余万。湘西处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饥民成批死亡。并非最重的晃县在春荒中就饿死千余人^[16]。辰溪竟发生饥民杀子充饥事件^[17]。荒情之烈,可以概见。

最后看南路。南路即湘南,共24县。该路平原与山地平分秋色,平常年份尚可支撑。当冬春之交春荒在中路、西路爆发、蔓延时,该路尚称安宁,但随着时光的推移,该路各县青黄不接愈趋危迫,无法招架,不得不报荒求赈。最先报荒的是衡阳。5月该县米价每石涨至十一串,而公私仓储皆罄,告粟无从,被迫向省当道求援。另一富县衡山县自冬天以来,即有乏粮之忧。5月,该县“千钱斗米,十室九空,荒象已成”,该县士绅被迫电请湖南义赈会“设法维持”^[18]。6月,衡山、永兴两县“均哀鸿遍野”^[19]。酃县米价“每斗已涨至一千二百文上下,各乡报荒者日必数起,即城市地方亦几有无米为炊之势”,大山之中,已发生“因饥甚而自戕”之事^[20]。同月,安仁饥民忍无可忍,围困县公署^[21]。除上述各县外,南路春荒县份尚有零陵、江华、郴州、汝城,合计受灾县份共9个。与中、西两路相比较,南路受灾的区域并非太广,受灾程度

亦难望其项背。

表1 1921年湖南空前春荒各路情况简表

区域	总县数(个)	受灾县数(个)	起讫时间	危害程度
中路	27	22	1920年11月至 1921年7月	较重
西路	24	23	1921年2月至 1921年9月	奇重
南路	24	9	1921年5月至 1921年8月	一般

资料来源:根据1920年11月至1921年8月《大公报》辑出

不难看出,湖南此次春荒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持续时间长。南路受荒自5月荒象初呈至8月收获期,持续了四个月。中路若自1920年11月算起,至1921年7月中旬新稻登场,则持续了九个月之久,西路即自1921年2月计算,至9月秋收穿荒,亦延续了八个月的时间。这在湖南近代史上是很少见的。
②涉及范围广。受灾县份中路有22个,西路23个,南路为9个,合计54个,而其时湖南共75县,可以说,受灾区域覆盖了湖南的大部分面积,幸免者仅占少数。这样大范围的春荒在湖南近代春荒史上尚未见先例。
③危害程度深。各荒县米价均远远逾越各该县数十年来的最高价,甚至创下了无可企及的记录。全省饥民至少亦在500万人以上,当时全湘人口3000万,也就是说,每六位湘民,即有一人为灾民。至于直接因饿致死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亦当有万人之谱,间接因饿致死者当要倍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次春荒给湖南带来了空前浩劫。难怪时人称:“此次湘灾之重亘古所无”^[22],更有人将其与上年北五省大饥荒相提并论,认为“湘灾情形视北省有过之无不及”^[23],揆诸实际,此言并非虚语。正因为此次湘省春荒具有以上特征,而湘省又系产粮大省,故此次春荒在我国春荒史上应具有典型与标本的价值。这正是本文探讨此次春荒的动因所在。

二、春荒成因

湖南素为产粮大省,1921年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春荒。究竟是些什么因素导致此次奇荒的发生?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第一,持续多年的兵灾匪祸与沉重的捐税负担,弄得民穷财尽,是此次空前粮荒发生的主因。

1921年前后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四分五裂，南北军阀争权夺利，彼此混战不休，而湖南绾毂南北，地当要冲，因而成为四战之地。1917年9月，驻守湘南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人宣布独立，反对属于北洋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从而揭开了南北大战的序幕。30万大军展开了一场长达九个月的厮杀。战线几分布全湘，而以湖南富庶的沿湖地区至湘南的衡阳等地一线为主战场，战况空前激烈。一直到1918年6月，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告一段落。但数量庞大的北军仍驻扎湖南，虽军饷由中央发给，但军食却由湖南提供，况北军大多军纪败坏，对驻地绅民极尽骚扰。至1920年7月，北军全部离湘，湘军终于奄有全湘，此时湖南早已是满目疮痍，无一片净土了。以醴陵为例，该县“自民国六年举义以来，……军队往来屯扎，迄无虚日，其中供应之烦，焚杀之惨，溃兵之搜刮，游匪之敲剥，全县资财，耗丧净尽，无论贫富，毫无余积”^[24]，醴陵如此，其他县岂能物外？其原因，无非经过多年的战事摧残及庞大的驻军骚扰后，阡陌沦为战场，长期积累的物质菁华毁于一旦，农夫化为炮灰，农时尽误，田园荒芜，各军强借勒索无有己时，各县早已无力承受。特别是各县用以备荒的仓谷被军队或挪借一空^[25]，或消耗无余^[26]，对以后各县应对1921年春荒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尤有进者，湖南人民除饱受兵灾之苦外，尚要忍受匪祸横行之痛。湖南素来民风强悍，又处百业凋残、兵荒马乱的岁月，结果土匪蜂起。山区有山匪，湖区有湖匪，平原有飘匪，甚至还有教匪^[27]。这些土匪少则几十人，上百人，多则千余人，甚至数千人，官厅剿不胜剿。他们横行乡里，杀人越货，人民不胜其苦，如湘西数年来“遍地匪灾”，甚至兵匪难分，结果“田园荒废，民鲜盖藏”^[28]，其中大庸土匪异常猖獗，弄得“商不可市，农不可耕”^[29]。安化竟至于“县属无村不墟，无家未劫”的地步^[30]。土匪的横行使生产力遭到进一步破坏，社会财富的积累更难措手。本已疲惫的湖南城乡雪上加霜，更加萧杀凄凉。

兵灾匪祸之余，城乡百姓尚要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与需索不已的抵借。经历任督军巧立名目的搜刮后，全省已到了无物不税，无事不捐的地步。以沅陵为例，“戊己两年，朱旅盘踞，巧立储捐筹借之名，肆行敲剥之计。每亩六角，两度勒捐，虽在极贫，无或幸免。庚申……而修理堤工，亩需数斗之谷，供给赋税年征两载之课。矧学堂有捐，警费有捐，军事招待又有捐”^[31]。收获有限，支给无穷，沅陵状况正是全省税

捐沉重的一个缩影。湘省田赋正供并非过巨，但田赋附加很重，往往超出正供一、二倍。1920年田赋附加竟达到每正银一两带征三元六角的程度^[32]。此外，各县尚有数额巨大的捐借，均是有去无回，血本无归^[33]。1920年6月湘军占领全湘后，湘民以为可以稍纾担负，不意军政当局搜刮民财，花样翻新，竭泽而渔，更为严厉（参见表2）。而此时正处在空前春荒到来的前夜。与乡间民众一样，城镇商人亦为湘省当道敲骨吸髓的对象。商人处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惨淡经营，获利极微，甚至亏累，但政府方面全不计及，只知需索，如长沙商会自1920年6月起至1921年3月止，先后被政府强行借去130余万元，许多中小商人周转陷入困境，膏血逐渐丧失殆尽^[34]。

表2 1920年6月至1920年12月湖南民众额外负担变化情况简表

名目	实施当局	实施时间	实施范围	主要内容	备注
善后借款	湘军	1920年6月起	全湘	以办理湘省善后的名义向各县强行摊借款项	总数不详，收束时间不明
盐斤加价	省政府	1920年8月起	全湘	每一百斤盐加抽特捐两元	因盐商罢运，该措施于9月中止
厘金增重	省政府	1920年9月起	全湘	原征光洋一元者加征六元，原征铜元百枚者改征一元	该措施遭各方强烈反对，于10月取消
田赋特捐	省政府	1920年10月起	全湘	田赋每元加收特捐一元	各县纷纷抵制，12月停止征收
提前开征	省政府	1920年12月起	全湘	提前半年征收1922年度田赋	1921年催征甚严

资料来源：根据1920年6月至12月《大公报》辑出。

总而言之，连绵多年的兵灾匪祸与当局变本加厉的盘剥，使得湖南城乡财力消耗殆尽，正如同各地报荒电文中所称“十室九空”，广大百姓处在凄风苦雨的社会环境下，只求生命苟延残喘，遑能顾及其他？湘省的窘境，纵最高当局亦不能漠然视之。省长林支宇坦承“湘省频年兵灾，民力凋残，三摘之后，其蔓已稀，再剥之余，其骨已瘦，今人民即有捐输之力，而官吏已无征榷之名”^[35]。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亦称“湘

民久困，已同涸鲋之鱼”^[36]。仓谷已被军队挪借吃尽，私谷又被变卖一空，春荒之来，不可避免，而湘民一穷至此，已基本丧失了抵御春荒的能力。这就难怪 1921 年青黄不接衍变成春荒，而春荒能肆虐于七泽三湘了。

第二，省县财政濒于破产与金融枯竭，是此次空前粮荒发生的辅因。

春荒之来，本不足惧。如果省、县财政充裕，尽可以向省外乃至向海外购粮，运回接济，将荒情尽早消弥于无形。近代日本粮食极其匮乏，严重春荒的发生则比较少见，其原因端在官绅能腾出充裕资金，在境外购回大批粮食。然而，1921 年湖南空前春荒前夕，省、县财政俱濒于破产，加以金融枯竭，官府方面对春荒基本上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肆虐了。

先来看省财政。1920 年 7 月湘军占有全湘后，湖南全省千疮百孔，税源雍滞，而军政开支浩繁。此时湘省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就已经非常严重。该年夏，财政厅开列本年度（1920 年 7 月至 1921 年 6 月）预算，岁入金额只有 1700 万元，岁出金额却达到 2670 万元，不敷达 970 万元^[37]。自 7 月至 9 月，省属各机关收入仅区区 170 万元上下，而支出方面，此三月政费约 120 余万元，军费约 300 余万元，收入只占支出的小半^[38]。10 月，湘省又有 200 万元的开支无着，而湘西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尚需另筹一笔特别经费^[39]。此外，自 1917 年起，湘军历年积欠的军饷至 1920 年 6 月止，已达一千数百万元^[40]。翌年春，湘军每月军费达到 100 余万元，政费 40 余万元，而财厅月入不过 70 万元^[41]。至 1921 年 6 月，积欠军政各费达 500 余万元（不包括巨额军队存饷）^[42]，各军事、政治、教育机关积欠军饷或工资少则三个月，多则十个月，结果风潮迭起，财政厅长虽频频换人，亦罗掘俱穷，改变不了库空如洗的局面。省财政在 1921 年春荒前后实际正处于“扫地无灰之境界”^[43]。

地方财政也在日趋恶化。湖南各县早在 1920 年 6 月前即已卖尽官产及地方公产^[44]。本年度财政预算，地方经费亏空达 140 余万元^[45]。如 1921 年初春，江华“行政经费无着，地方财产一空如洗”^[46]；茶陵“地方财产奇穷，各机关行将中断”^[47]；溆浦“保管处莫名一钱，诸事棘手”^[48]。类似情形不胜枚举。各县没有办法，只得不顾百姓死活，在原征杂税项下实行加重，或在田赋上多征附加，或干脆提前征收下一年度赋课。不难看出，各县连基本运转都无法维持，焉有余力对付春荒？

表 3 1919 至 1921 年湖南财政预算岁入岁出简表

年度	岁入金额 (元)	岁出金额 (元)	盈余金额 (元)	亏空金额 (元)
1919	7 390 000	5 850 000	1 540 000	
1920	17 000 000	26 700 000		9 700 000
1921	16 500 000	22 400 000		5 900 000

说明：采自陈子钊编：《湖南之财政》第二章第 8 页（湖南经济调查所 1934 年版）。因 1920 年前后各年收支统计及预算分册，均毁于 1930 年 7 月，详数无从查考。

与此同时，湘省金融枯竭，各地钱荒严重。1918 年前，湘省工矿业较为发达，尤其是矿砂出口，获利可观，茶叶等远销俄罗斯等地，虽时政日非，湘省金融形势不至于十分险恶。1919 年后，各工厂摇摇欲坠，临于绝境，各矿山因矿砂出口锐减而生存维艰，茶叶等生意更是一落千丈，湘省金融乃面临空前危机，一方面，市面现金奇缺，银根窘迫，另一方面，纸币充斥，但因其信用早失而被拒用，结果许多地方闹起了钱荒^[49]，各级机构筹钱至为不易。

第三，灾荒频仍，连续多年收成歉薄与 1920 年的谷米弛禁，是此次空前粮荒发生的诱因。

湖南省境多崇山峻岭和水系。全省地势南高北低，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此种地理及气候上的特点，使得湖南春夏之间常多暴雨，其他时节易生伏旱、干旱，因此湖南自古以来就属于灾害频发的省份。民元以后，湖南省、县均设立了农会机关，省中设有水利局，但这些机关多不过是官绅争名逐利的场所，诚如时人所言，“皆有名无实”^[50]。所以湖南水利水平低下，难以对付天灾。可以说，湘省绝大多数县份农业收成完全视风调雨顺与否为转移，而湖南自然灾害又不断发生，结果 1921 年前的若干年，湘省粮产连年收成歉薄。如 1918 年夏，湘中，湘西大水成灾，受灾的县达到 18 个，且多为湘省产米大县^[51]。平江、南县则为大旱，几近绝收。1919 年夏，滨湖一带华容、安乡、澧县等处又遇大水，堤垸多被冲倒，湘西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沿河地带全被淹没^[52]。新化、醴陵、永绥、乾城、凤凰等县则爆发虫灾，本年受灾县份及被灾程度不及 1918 年严重，但粮食歉收系不争事实。1920 年，醴陵、衡阳、华容、安化、宝庆等十几县遭遇水灾，湘西桑植、大庸等地则大旱，尽管本年各县发生的自然灾害在湖南历史上谈不上重大灾害，但由于波及范围广，本年湘省粮产又大减，尤其是湘西，秋收几乎无望^[53]，各县且多有并发旱灾、虫灾者，直接诱致 1921 年春荒的发生。

湘省连年粮食歉收，本应实行自1917年以来的禁止粮食出省的政策，因为湘省尽管为产粮大省，但能输出粮食的地方只有滨湖及湘江中下游一带各县，其他县份或仅可自给，或则须他县接济。因此，湖南并非绝对的粮产过剩。历来粮食一旦歉收，湘省自供有虞，即实行封关。在1917年、1918年、1919年湘省连续封关三年后，湘省1919年、1920年歉收如故，然而统治集团为了收税敛财，以期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却于1920年春，决定谷米开禁，结果湘省自该年春起至1921年5月止，谷米源源不断运出省外。据粗略统计，此一时期，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出口的粮食达320万石，外省来湘采办的军米及赈米至少200万石，奸商与不法军人互相勾结偷运出境的粮食亦有数百万石，年余之间，装运出省者，最保守的估计，亦有近千万石^[54]。而湘省即使在丰年，外输粮食多以300万石为率，至多500万石^[55]。现在遇歉收之年，竟外输千万石，由此可见湘省粮食漏卮之严重。朝野均只计及眼前，谷米为之一空，春荒之来，不可避免。

表4 1920年1月至1921年5月湖南米禁开驰情况简表

批准出口者	出口时间	出口定额 (万石)	实际出口额 (万石)	备注
省政府	1920年1月	200	200	该定额输出在1920年6月湘督张敬尧离湘前即已完成
省政府	1920年11月	20	20	因军队闹饷，省政府临时出口20万石以筹措军饷
省政府	1921年1月	150	100	至1921年5月封关止，尚余50余万石的定额

说明：根据1920年1月至1921年1月《大公报》《申报》辑出。本表出口数不包括外省来湘采办的军米及赈米和奸商与不法军人勾结偷运出境的粮食（此两项共计600多万石）。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导致此次空前春荒发生的原因委实错综复杂。尽管存在气候失调、粮产减少的因素，但基本因素却是兵灾匪乱与统治者的苛政，皆属于人祸范畴。1921年8月，深谙湘省内情的湘籍名流熊希龄曾在旅京湖南急赈大会上指出：“湘省今年荒灾，人祸实居其七，天灾实居其三。”^[56]其措辞精辟之至，可谓一针见血。

此次春荒发生后，随着饥馑范围的扩大与程度的

加深，粮食恐慌日甚一日，社会愈加动荡不安，统治者赖以维系的秩序受到了严重威胁。湖南省政府被迫走向赈济春荒的前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疲软乏力，收效有限。关于此次春荒赈济的详细情况，作者将另文予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民意：《中国米的生产及消费》[N]. 建设，第一卷第二号，1919-09.
- [2] 阮湘. 中国年鉴(第一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1114.
- [3]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M]. 北京：三联书店，1957：228.
- [4] 安化全县代表请赈呈文[N]. 长沙：大公报，1920-07-18.
- [5] 蓝田灾民逃荒来省[N]. 长沙：大公报，1920-11-23.
- [6] 醴陵大饥之惨象[N]. 申报，1921-04-28.
- [7] 永保龙桑绥古之艰困[N]. 大公报，1921-02-26.
- [8] 湘省大饥之惨象[N]. 申报，1921-05-18.
- [9] 湖南米荒可虑[N]. 天津：大公报，1925-06-02.
- [10] 各县报荒的来信[N]. 长沙：大公报，1921-05-24.
- [11] 湘省春荒与救济[N]. 申报，1921-05-21.
- [12] 醴陵荒灾之原因[N]. 上海：民国日报，1921-05-25.
- [13] 湘省饥荒之日亟[N]. 申报，1921-05-25.
- [14] 沅陵电请加赈[N]. 长沙：大公报，1921-05-20.
- [15] 晃县旱灾之呼吁[N]. 长沙：大公报，1921-09-03.
- [16] 武冈饥民暴动[N]. 长沙：大公报，1921-06-21.
- [17] 湖南辰溪哀鸿嗷嗷[N]. 上海：民国日报，1921-9-07.
- [18] 晃县旱灾之呼吁[N]. 长沙：大公报，1921-09-03.
- [19] 杀子充饥之惨情[N]. 天津：大公报，1921-08-24.
- [20] 湘南亦有两县报荒[N]. 长沙：大公报，1921-05-22.
- [21] 湘省米荒之惨象[N]. 天津：大公报，1921-06-03.
- [22] 两个请赈的快邮代电[N]. 长沙：大公报，1921-06-17.
- [23] 急赈会公文一束[N]. 长沙：大公报，1921-06-15.
- [24] 湖南华洋筹赈会成立之电告[N]. 申报，1921-07-12.
- [25] 湘省灾荒之惨象[N]. 申报，1921-08-22.
- [26] 醴陵荒灾之原因[N]. 上海：民国日报，1921-05-25.
- [27] 如宝庆、澧县等县. 兵灾纪略[J]. 湖南历史资料[C]. 1959,(3): 131
- [28] 澧县请拨还仓谷[N]. 长沙：大公报，1921-03-25.
- [29] 各县之请赈电[N]. 长沙：大公报，1921-06-14
- [30] 醴陵灾民呼声[N]. 天津：大公报，1921-01-18
- [31] 临湘竟发生拳匪[N]. 长沙：大公报，1921-02-23.
- [32] 各处饥荒之呈报[N]. 长沙：大公报，1921-03-23.
- [33] 大庸又来函报荒[N]. 长沙：大公报，1921-05-19.
- [34] 安化全县代表请赈全文(续)[N]. 长沙：大公报，1920-07-19.
- [35] 沅江公民代表呈请省长借谷救荒文[N]. 长沙：大公报，

- 1921-05-16.
- [36]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571.
- [37] 八县代表请还借款[N]. 长沙: 大公报, 1920-09-24.
- [38] 商会之紧急会议[N]. 长沙: 大公报, 1921-05-26.
- [39] 林支字表明去职之原因[N]. 长沙: 大公报 1921-03-23.
- [40] 急赈会发出文电一束[N]. 长沙: 大公报, 1921-05-17.
- [41] 陈子钊. 湖南之财政(第二章)[M]. 长沙: 湖南经济调查所, 1934: 8.
- [42] 省长关于田赋特捐之咨复[N]. 长沙: 大公报, 1920-11-12.
- [43] 湖南财政概况[N]. 长沙: 大公报, 1920-10-20.
- [44] 省署之借款会议[N]. 长沙: 大公报, 1920-12-9.
- [45] 财政厅向各机关职员诉苦[N]. 长沙: 大公报, 1921-08-08.
- [46] 发行八厘公债之交议[N]. 长沙: 大公报, 1921-06-04.
- [47] 湖南财政窘况一斑[N]. 天津: 大公报, 1921-06-03.
- [48] 湘南民穷财困之实况[N]. 长沙: 大公报, 1920-02-27.
- [49] 地方经费亏空之实数[N]. 长沙: 大公报, 1920-11-16.
- [50] 江华人民之呼吁[N]. 长沙: 大公报, 1921-01-28.
- [51] 茶陵知事告急电[N]. 长沙: 大公报, 1921-03-15.
- [52] 各处饥荒之呈报[N]. 长沙: 大公报, 1921-03-23.
- [53] 衡阳特约通信[N]. 长沙: 大公报, 1921-01-06.
- [54] 湘省金融停滞之原因[N]. 长沙: 大公报, 1921-01-13.
- [55] 朱义农. 米价腾贵之原因及救济策[J]. 中华农学会报第二卷第二号, 1920, (11)
- [56]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第一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 385-386.
- [57] 夏明芳.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373, 附表.
- [58] 湘省农民之现状[N]. 长沙: 大公报, 1919-09-01
- [59] 湘西各县之灾情[N]. 长沙: 大公报, 1919-09-11.
- [60] 湘西要讯[N]. 长沙: 大公报, 1920-09-14.
- [61] 湘省大饥之惨象[N]. 申报, 1921-05-18.
- [62]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632.
- [63] 湖南旅京急赈会开会纪事[N]. 长沙: 大公报, 1921-08-14.

A probe into the cause of the unprecedented famine in Hunan in the spring of 1921

ZHANG Andong

(History Department, Chaohu College, Chaohu 238000, China)

Abstract: Hunan Provinc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for production of grain since ancient time. It also took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grain all over Chin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However, betwee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1921, there occurred an unprecedented food crisis in Hunan Province characterized by its longer continuance, greater perniciousness than ever before. Although there existed an intricate combination of bad weather and reduction of grain, its essential cause came from the social turmoil and chaos caused by war and banditry and the exorbitant taxes and levi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dire poverty of Hunan people who had no means of livelihood to tide over a lean year and the financial crises of both the provincial and county governments which had no means to confront the spring famine due to crop failures with worsening situations. In short, the main cause of the famine in that year was seventy per cent due to war and banditry and thirty per cent to the natural calamities of flood and drought.

Key words: spring famine; war and banditry; natural calamities

[编辑: 汪晓]